

第一编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 关系和英国政府对 浙江的战略意图

第一章 英国侵略势力向浙江扩展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摘要）

〔英〕格林堡著 康成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1、鸦片输入前的中英贸易

一百年以前，西方用商品、枪炮和思想侵入了中国。欧洲侵入者在经济上征服中国经过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大约从 1826 年起，贸易差额变得有利于外国人，白银的流动改变了方向。在第二阶段里，英国的制造品开始涌入中国，因此这个几百年来一向以纺织品著名的国家，在 1870 年至 1880 年之间，输入兰开夏棉制品竟达它的总进口货的三分之一。第三，随着外国制造品而来的是外国资本的流入，它带来了铁路、纺纱厂以及类似的需要资本积累的企业，而资本积累在中国是缺乏的。 * * * * *

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

本资料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业技艺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

在欧洲人冒险东进以前，红海和黄海之间早已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商业，无法作统计上的计算，但是合计起来数目一定很大。单是中国帆船就每年载运大量生丝、绸缎、磁器、白铜、大黄、樟脑、螺钿、檀香、锡、象牙、香料和珠宝玉石等等往来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的商埠之间。这种贸易的数量使早期的西方旅行家大为惊讶。他们把东方奇富的神话带回西方，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公的渴求土地的年轻子弟以及各航海国的冒险商人都大为心动。可是想去东方为欧洲产品“开辟”市场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为了国内制造家的利益，公司被夺去了从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它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

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1664 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是二磅二盎司；1783 年公司销货中售出的数量则是 5,857,822 磅。下一年抵代税条例公布 茶叶关税从百分之百以上减到百分之十二点五。在 1785 年，售出的茶叶达一千五百多万磅，在公司垄断权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数量平均约为三千万磅。从中国进口的“奢侈品”——磁器、漆器、丝绸等等——仍继续不断，有时由于理性时代和华丽建筑的影响，崇尚“中国货品”，这种进口甚至有所增加。但是到十八世纪末叶，这东印度公司倾向于把这宗贸易留给它的船长和船员的“优待吨位”去做，本身却集中力量经营茶叶贸易。在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它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茶叶。茶叶已经成了非常流行的全国性的饮料，以致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三百三十万磅。从中国来的茶

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

.....

茶叶只能从中国取得。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公司开始在它的印度领土内试种茶树。树苗是从中国运去的，移植在喜马拉雅山一带。但是印度茶叶向中国的挑战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英国对茶叶的要求虽然已经增长，可是中国酬答这种要求的愿望却没有跟着发展起来。事实是中国向来没有打算同欧洲人接触，但是却拥有吸引他们的货物。当 1793 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奉派为大使，携同英国制造品的货样前往中国的时候，他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答复：“奇珍异宝 并无贵重……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云正使等视见；然从不贵奇巧 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这项声明并不象那些被困惑的和希望落空的外国商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妄自尊大”或“反商主义”的精神，而是反映出中国农业经济、广大的国内贸易和城市手工业的基本自给自足的情况；而且后者所生产的制造品已经超出了农村家庭工业的财力或农民的需要。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一百年之后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中国方面这种有效需求的缺乏 造成了旧的对华贸易的根本问题，即一面倒的贸易差额。

这个问题，如它具体表现的那样，就是怎样在广州筹措那笔购买茶叶、数量较少的丝绸和英国所需要的其他“中国货物”的资金。由于中国不关心欧洲的大宗产品，所以只能用金银块和金银币去购买中国产品。在缺乏适当交换媒介的中国（铜“钱”在大宗交易上固不合用；纹银“元宝也太笨重”）就发展了一种吸收新旧的西班牙鼓铸的银元的能力。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保存下来的南北美的掠夺物来支付一部分中国

货的价款。葡萄牙人在东方海洋上的定期的劫掠，为澳门增加了可以利用的“财物”。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开始起就感到有携出大量金银块和货币来供应东方贸易资金的必要。在 1601 年至 1624 年它的经营活动的最初二十三年内，它向东方输出的现金为 753,336 镑 主要是西班牙银元，而货物仅值 351,236 镑。一百年以后，金银同货物的比例依然如此。在 1710—1759 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后的五十年中，英国向东方的出口计有金银 26,833,614 镑，货物仅 9,248,306 镑。

再就中国贸易本身来说，我们发现英国人第一次去广州的尝试——即著名的韦德尔船长 Captain Weddell 1637 年的远征——并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东印度公司第一批驶往中国的船只，卖出去的英国货也极少。马士 Morse 曾经列出最初驶往中国的船只中一两只船所装的货物。因此，在 1699 年属于新英国公司“马克来斯非尔德号船”Macclesfield 的“财物”中，计有 26,611 镑的现银和 5,475 镑的货物，货物主要是呢绒，其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卖出；在 1751 年有四艘船载有价值 119,000 镑的现银和仅值 10,842 镑的货物从英国驶往中国。……在马士所举的实例中，现银所占比例曾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情形。

英国的商业是由于在欧洲市场上出售羊毛以及后来出售呢绒而建立起来的。在棉织品有惊人的发展以前，这是英国所必需推销的主要商品。在公司运往中国的主要“英国货”中，计有毛货、宽幅呢、哔叽、羽纱以及一些铅和偶尔一些康华尔的铜或锡。但是即使英国货的全部“财物”售罄，通常不是明亏，就是被中国货的物物交换过程掩盖了的暗亏。这种过程叫作“易货”；英国毛货等的售价，是规定茶丝价格的根据。据 1820 年估计，广州销售英国产品的净亏损额在前二十三年中共达 1,688,103 镑。

最后，到十八世纪末叶，在茶叶的装运量主要由于庇特的抵代税条例而迅速扩张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足

够的货币运往广州。1779年，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西班牙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 1779 至 1785 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就是在恢复装运现金银之后，茶叶投资的增长也速于现银的流入。广州的英国货市场既极有限，即便是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而欧洲方面的现银供应又越来越靠不住，英国输往和输自中国的进出口货之间的差距就变得惊人了。所以，自 1792 年至 1807 年，公司从广州运到英国的货物计值 27,157,006 镑，而从英国输往广州的却只有 16,602,388 镑。虽则硬货主义的理论已不大流行，可是无论如何，专靠现金银总归不是贸易的好办法，而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一些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第 1—8 页）

2. 鸦片走私贸易的发展

解决办法终于在印度找到了。据发现，中国方面对英国货虽然没有多大胃口，可是却极愿接受英属印度的产品，特别是原棉和鸦片。……

这种发展的后果从中国贸易差额的变化中可以看出。1804 年以后，公司必须从欧洲运往中国的现银数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输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银倒流。在 1806 年—1809 年这三年中，约有七百万元的银块和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收支差额；自 1818 年至 1833 年，现金银在中国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1817 年，运到广州的非欧洲商品计一千余万元，而英国货为三百五十万元；1825 年，前者是一千七百五十余万元，后者是三百五十万元；1833 年，前者两千万，后者三百五十万元。英国货的数量保持不动，使广州国际贸易差额发生根本变化的是中印之间的贸易。

……

马治平比起大多数“中国通”来是一个比较没有偏见的人，他承认“我们同中国的早期贸易显露出生意做得很不规矩，并且把英国人的品格也表现得很不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初次出现在中国沿海一带是一群孜孜为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中国人在欺诈和骗人的手法上总是比他们更高明些；但是，一个聪明地把和平的利益看作是一个国家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的民族，对于这种早期的冒险家给以他们应得的冷淡和轻蔑待遇，也是无足为奇的事情。”

欧洲人在亚洲的扩张情况，要比那酗酒的英国水手在广州时常发生的暴行可怕得多。西班牙人早就在菲律宾地方屠杀过四万多中国人。十八世纪英国对于印度领土的掠取，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同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尼泊尔的战争，英国的武装力量伸展到中国的后天井。英国议会两院审查委员会对于印度和缅甸战争在中国对旅居广州英侨的态度上所起的影响，也曾感到忧虑。德庇时说这使中国人“特别不相信”英国人。早在 1717 年康熙皇帝就警告说：“应当认识 在未来的千百年中 中国怕会有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

欧洲人对于中国同外部世界“隔绝”所作的轻率假定，只是反映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个经历的无知。许多世纪以来，中国时常受到从北方来的压迫；外族的侵入是一个经常的威胁，为了防范这种侵入就建筑了万里长城。从船上来的西方人是“海夷”；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起北方的外族来更加不相同，也更能扰乱中国人的文化。对于这些从海上来的侵略者也必须修造一道万里长城。由于清朝海防非常薄弱，由于帝国内部潜伏的对立力量，又由于缺乏一套对付外国人的适当的法律制度 外国人在一年一度张贴在广州商馆的告示文字中，觉得“很难理解天朝的礼仪”，于是一种“限制”政策就似乎是必需的。在坚持推行闭关政策上，政治的考虑更强于经济的考虑；这可能和日本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也纳入那苦心规划的广州“保商”制度范围以内。

广州对外贸易垄断权受到一种远比澳门或厦门所能提供的重大得多的侵害 这就是 1821 年以后“外洋停泊处”大规模非法贸易的发展。在那一年，中国当局在取缔黄埔鸦片贸易方面取得了成效。以詹姆士·马地臣为首的散商，开始将他们的鸦片船只驶往伶仃岛，这个岛和金星门之类的其他“外洋”停泊处以及后来的香港，直到 1839 年林则徐来到之前，一直是鸦片集散中心。从离开邻近广州官厅的地方之后，这种违法贸易大大发展了，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增加了五倍多。这种贸易，以及中国东海岸上的非法贸易 它的发展稍迟一点，但它却是依靠经常停泊在伶仃的趸船供应的，都是不在广州制度范围之内的。

并且，在伶仃岛走私的还不仅仅是鸦片。凡是中国加以限制的物品那里都有。……在詹姆士·马地臣的日常事务函牍中，合法的输入品和输出品经由伶仃岛走私借以逃漏在广州应付税款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这样就很明显 在 1821 年以后，英国贸易的一个极大部分，已经越出广州制度的范围；这个数量究竟多大，我们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到 在 1842 年以前的最后十年间，单是鸦片一项就构成英国向中国输入总值的三分之二左右。

（第 8-9: 41-46 页。）

3. 鸦片走私的扩大

鸦片成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惹起好几年的战争，在维多利亚的英国，它引起半个世纪道德上的争论。……鸦片并不是一个秘密的走私贸易，而或许是当时经营单一商品的最大的贸易。1840 年 威廉·查顿曾引用议会两院“在主教们坐满后排议席的情形下”所一再宣称的取消这项贸易是财政上的失策那句话，来为他作为主要鸦片商的行为辩护。在当时，那些指导英国政策的人们，并不比一般犬儒主义者高明多少。他们鉴于所涉物质利

益之大，也就不禁见利而忘义了。鸦片贸易所以重要，并不仅仅由于它本身的规模和可以获利的性质，虽然这些因素也没有被忽视。当时的商业指南编纂者菲普斯，曾把鸦片贸易的规模说成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项消费品都不能与它相比。”查顿有一次从广州写信给在艾赛克斯的朋友，怂恿他投资于鸦片贸易，说：“据我所知 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多年以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差额情况的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用茶叶作为汇划资金和交流物资的手段，又使大量的收入流入英国国库，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贫困就给英国每年带来六百万镑。……

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最后，鸦片贸易完全是在广州商业组织以外，它是在广州以外的地方，通过行商以外的途径经营的。它的这种做法上的特点，结合它的大量增加对于财务上的影响，便促成了那次危机的暴发，在那次危机中，中国同外国之间的整个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诉之于武力了。鸦片不是一个小的和偶然的问题，而是核心的问题。

鸦片目的地的中国，朝廷和地方都一再下令禁止输入和吸食这种药品。第一道谕旨在 1729 年颁发，以后的各次命令都是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久已实行的禁令。切实的禁烟是在 1799 年的上谕中申明的，这项上谕曾提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分以外各地“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的蔓延。但是这种贸易仍然继续违法进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用一种经常的方式”走私运到中国东部沿岸，……这种违法的鸦片贸易一般是十分公开地进行的。

在 1800 年与 1838 年 鸦片战争前夕 之间的鸦片“商业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21 年以前是第一个时期，当时鸦片贸易被逐出于粤江之外，所有的鸦片进口每年很少超过五千箱，平均在四千五百箱以下。第二个时期，1821 年到 1830—1831 年之间，由于白皮土的消费迅速增加和公班土的消费的稍有增加，就引起了英国商人与澳门的居民之间为控制这项贸易而展开的剧烈斗争。鸦片的走私，除了詹姆士·马地臣曾有几回开辟东海岸的贸易但没有成功的企图之外 全部都是在停泊在“外洋停泊处”特别是伶仃岛停泊处 的船上进行的。在这个时期中，全部销售量几乎总是随着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是每年的平均数总在一万箱上下，其中大半是白皮土。在第三个时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急剧扩张，从 1831—1832 年的一万六千五百五十箱增加到 1835—1836 年的三万多箱，在 1838—1839 年就达到四万箱。这是由许多力量促成的——印度的扩张主义的生产政策；从印度驶出的快艇和沿中国海岸上驶的商船队构成了新的分配组织；因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取消散商向广州的涌入。鸦片走私不再限于伶仃岛，而迅速地沿着东海岸和南海岸发展。在战争爆发的前三年 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时期，鸦片走私又象 1821 年以前那样在广州水道出现，所不同的只是此时在数量上已超过以往六倍。

（第 95—103 页）

4、鸦片与战争

1830 年 12 月，呈递下议院的一件值得注意的请愿书已经起草竣事，并且由包括船长在内的四十七名英国旅华散商签署。它论证说，尽管中国方面的限制重重，可是对华贸易已经增长“到了这样的规模，可以烦请贵院将它放在一持久的、体面的基础上；两次遣使北京 即马戛尔尼使节和阿美士德使节 的完全失败，大概贵院也不会不了解任何高尚的外交手段在中国是不会有什

收获的；“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可言。”它继续写道，“申请人等相信，如有一位英王陛下的代表常驻北京，受命以保护侨民利益的适当精神行事，则必获致最有利的结果。”如没有陛下政府的这种直接干涉，请愿书中辩称，恐怕对华贸易不会有什么很大开展。至少希望英国政府“能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使世界上这个僻远地区的英国商业不再受虐待和压迫”。马地臣赞成伶仃群岛中的一处，查顿则赞成台湾。查顿对于 1832 年台湾惊人变乱的消息所发生的反应是，“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只要我们给他们一点帮助就可以在岛上得到一个立脚点。”

1834 年 12 月，他们起草了一项上英王的请愿书，请求委派一位全权公使，在三艘战舰的支持下，提出下列要求：（1）赔偿停止贸易的损失，（2）开放北方各口岸，（3）结束公行的垄断权。认为要维护“安全和持续的对华通商所能给予英国税收以及英国工艺和制造业方面有利害关系的各重要阶层的利益”，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詹姆士·马地臣相信，“不要行商居间舞弊而同〔中枢〕政府直接往来这一点，对于贸易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争取不到，英国政府就不能安枕无忧。”

早在 1830 年，广州的散商就已经想到使用武力，至少是炫耀武力来达成他们的要求。在 1831 年驻印度的一支海军分遣队访问中国的时候，查顿写信给威亭说：“我不知道舰队司令能够从什么机关奉到命令可以开始一场对中国的战争，除非是他能挑逗中国兵船对他开火，可是这种情形不大会有。时间必须决定，但是我不能让我自己来认真设想一场公开的决裂。”第二年他认为决裂未始不可能。“除非英国政府出面干涉，现在是毫无办法。”查顿在给马地臣的信件中，对于本国政府的慎重态度时常露出愤怒的情

指旅华英国鸦片贩子

绪。所以当他听到中国方面拿捕了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并给他加上锁枷的消息时，他说：“我由衷地希望陛下的大臣们也都和他一起披枷带锁。”但是他仍然认为不须流血就可以得到一项“公平的通商条约”。律劳卑勋爵强行改革的尝试失败之后，查顿声称，中国对于维持现行制度似乎下了前所未有的决心，正不惜重资修建沿海沿江炮台。这时就连伦敦也认识到，不做一次可能导致战争的武力的炫示，改革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从中国资料中得知，中国政府经过对鸦片贸易解禁抑或厉行禁止这两种相反政策的争论之后，到 1836 年 11 月，终于决定采取后一种政策。外商们并不过分惊惶。以往就有过禁止鸦片贸易的上谕；鸦片贸易常常被“查缉”。1834 年，由于地方当局的异常的查禁，有几个月无法获得现银去支付鸦片的价款。1836 年夏季，行商把北京方面争论的要点告知外商。

1837 年，中国的禁烟运动开始见效。“此间 广州 的洋药已完全陷于停顿；但是城里的 零售货价 已经涨得极高，以致不惜冒一切风险走私的诱惑力极大。货价是囤户抬高的，然而伶仃船上的交货由于完全没有需要，仍是寥寥无几。”这是 1 月份的事情，至 6 月间，查顿报告说，广州洋药市场已完全停顿，也没有一艘走私船艇能够往来行驶。“我们正用尽一切办法用欧洲船只将货物运往沿海岛屿间去销售。”但是甚至在沿海海面，官船也防范很严。在官船攻打鸦片帆船的一次“严重战斗”中，许多人被击毙，还有一百箱货物被毁掉了。沿海船队中的一些船艇，不得不折回伶仃根据地，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1837 年 11 月，查顿写道：“由于当局防范甚严，洋药市场正一天不如一天。”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沿海面多派出几艘欧洲武装船，去试探台湾之类的新市场。“但是沿海船只数目一多，迟早会惹起北京当局的注意，并迫使他们采取新办法。”

1838 年 9 月，随着禁烟运动的日紧一日，中国烟贩大为惊惶。在广东省内，总督派员在夜间逐户搜查。立刻有二千多名中国人因犯吸毒贩毒罪名而被监禁。到了年底，查顿写道：“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沿海的情况也是同样糟，福州的官员防范得特别严。全国各地都在捉拿吸毒和贩毒的人。最后，行商被“吓得”只好停止全部营业。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多少有点诧异的是，查顿和马地臣两人都把局面转变的希望，寄托在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会暴发成为叛变的可能性上。“除非公众不满的情绪能比以往更强硬地表示出来，我们就不能指望任何改善。叛变是我们所能想到的缓和局面的惟一的机会。”在广州，许多居民苦于官员没有搜查证就搜查他们的家宅的骚扰，已经在门上贴出漫骂的揭帖。查顿写信给在沿海一带的里斯船长说，“我认为你那一带的这种严重情形倒会造成一次公开的叛乱。这里都是些胆小的家伙，很能忍受他们的统治者的压迫。”

查顿在 1839 年新年“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写的一封私函中所提出的意见，就不象这样一相情愿了。他首先承认他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毫无把握，随后指出这次对烟商的“查缉”并不比以往几次过于严厉；但是却遍及中国各省，这是“前所未闻的一种情形。”倘使这种严厉的运动再继续一年，鸦片的消费似乎会跌落三分之二；但是他相信这会“在动乱较多的省份中……激起不满的情绪”。……

中国的禁烟运动在林则徐奉派为钦差大臣之前就已经收到相当功效。“鸦片船已经到过沿海的第一地带，但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可是林则徐的简派掀起了运动的高潮和加速了运动的步伐。……1839 年 3 月，他命令立即呈缴所有运到中国的鸦片，并要求外国行号的负责人将来须签具切结，对委托给他们的船只负中国法律上的完全责任。由于欧洲商人托辞搪塞，他停止了一

切贸易，并将他们圈禁在广州的商馆中，直到他们将所有鸦片呈缴并签具切结时为止。在“这次最不幸的危机”中，不会不出一些事情。

不仅是价值二百四十万镑的英国财产 20,283 箱鸦片照市价的估计数 行将被毁灭，不仅是全部对华贸易已陷于停顿，而且，正如马地臣所说，即使“走私”船艇再开始送货，林则徐的作法已经把广州的信用“永远”破坏无遗了。旧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

在这次“不幸”的局面中，义律上校给英商的命令中所提出的应变办法，是在英国政府保证发还全价的条件下，将鸦片呈缴。虽然商人大声诋责义律的“懦弱”，他的建议却被欣然接受了。他们借此可以照英国政府所担保的公平价格将印度鸦片全年产量的一半脱手，从而免去了将全季的存货留在手里的麻烦。而且由于大量鸦片被销毁的缘故，剩下来的还有按照比已往更高的价格出售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这时也直接卷进了漩涡。在 1839 年 5 月马地臣写给驻伦敦的查顿和约翰·亚贝尔·史密斯的重要函件中，他的议论是，义律的命令是“一个宽大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特别当中国人已经陷入使他们自己直接对英王负责的圈套中的时候。倘使他们拒绝接受 洋药，却让我们在这种把贩卖鸦片的外国人处以死刑的新法律之下，背负起如些沉重的一宗存货的包袱 其结果就会极为不幸了。”马地臣还透露 在义律到达商馆之前，有几个商人已经把他们的鸦片定货转到副监督的名下，以防被中国方面查获”。他还说，“所有新到达的鸦片寄售商都愿意把他们列入义律的呈缴名单中。”马地臣本人几乎要将鸦片船移开乍看来好象是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幸而没有这样作，否则就会“将财产置诸英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外了”。

他们恳请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以保全整个对华贸易，使它连同它的一切附带业务免于崩溃。早在 1837 年，义律就曾经要求派遣一支海军到中国，将整个对华贸易从地方政府狭隘精神使它陷入的困难境地中挽救出来”。鸦片呈缴之后 义律立即分函外交部

和孟买及孟加拉的政府，恳请它们声明准照呈缴之数发还全部价款；目的是”，马地臣写道，“在于增进一般的信心，并防止对于商业信用的打击及其一切有害的后果，……引起普遍的惊惶对于商业的每个部门都会有害的，一如 1837 年美国商家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很久之后，英国政府才负责处理旅粤商人的利益问题。马地臣在 1839 年 4 月当他还圈禁在商馆中的时候写道“我想下一个步骤就将是 对华战争。没收英国财产和拘留英国臣民提供了一个宣战的理由。

（第 163—164；176—186 页）

史学选译 北师大 1990 年（总第 17 期）

5、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摘要）

J·G 路兹作，李英桃、李树杰译

卡尔·郭士立……他“在中国沿岸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1831 年 6 月郭士立搭乘中国人的舢板驶向中国的沿海港口。他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人皈依基督，并在散发一些简单特效药的同时散发基督教小册子。郭士立向那条舢板上的水手、港口的商人传教，还在迅速劫掠附近村庄时向农民传教。第一次沿海旅行之后，他又进行一系列旅行。其中一些是乘船去探测广州以外贸易的可能性；一些是去茶叶产地搞茶苗，用以引到印度去；还有几次是同鸦片走私者在一起。在后几次旅行中，他充当参加违法交易的商人和中国官员的翻译和中间人。他的报酬是双份的：（1）向沿海地区村民们传播福音、散发印刷品的机会。（2）为他的中文期刊筹集经济资助，用来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成就。

.....

郭士立是扮演多种角色的人。1835 年，他接受了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的职务。1851 年监督去世之后，他又接着做英

州地区的闽江图。一些水手陆续在已经开始定期往返于沿海的鸦片船上得到了职位。在 1840 年和 1840—1842 年的北方战争中，英国战舰很好地运用了来自阿美士德勋爵号和鸦片经销商的航海情报及经验。胡夏米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这份报告被收入 1833 年的《议会文件集》。当时 郭士立出版了关于这次航行以及他以前在平底船上航行的日记。……

他们还提供了关于中国军队防备虚弱、官员们准备在动武之前放弃防止并允许贸易的消息。郭士立的结论是：通过谈判来得到贸易权利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暗地里进行些非法贸易，而英国人的强硬要求则将有助于进入港口。其言外之意是，武力威胁将是充分的，或者说，假如冲突发生，抵抗将是微弱的，很易被克服。所有这些观点都成为 1840 年议会争论所提及的内容。对各港口及厦门、宁波、福州和上海市场机会的评估为 1842 年条约开放口岸的选择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情报。……

作为首席中国专家的观点推荐给外交部长以引起注意。郭士立的《我们与中国关系现状短论》一文被附在 1835 年 3 月 26 日的报告之后。稍后，一份关于中国历史、地形、风俗、信仰、贸易、政府等的长篇手稿被送上去。1840 年《中国问题蓝皮书》利用了这些材料。手稿的缩写本在 1838 年两卷本出版，题名为《开放的中国》。

……假如贸易再次中断，就需要强有力的讨罚行动。他甚至提出对舟山进行一次海上远征的可能性，以给“中国人的骄傲自大以致命的打击。”……

但一旦战争出现，那么指责即是：中国人只崇尚武力，中国人在军力上非常分散、薄弱，对之稍微显示一下武力是需要的。战舰那时到得很慢，而且最初总共没有几艘船。

1841 年从舟山撤出部队后，义律造成了讨价还价地位丧失，这被解释成为进一步证实了普遍的看法，即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武力是一种有效手段，任何软弱的表示都会使中国人恢复其自大

国文职官员。……

郭士立有许多理由希望他在秘书的职位上对若干事件有所影响，至少是对在这一领域的事件有所影响。当时懂汉语的西方人非常少，这使得汉语秘书们的职权范围远远超过为其长官笔译和口译。当全权大臣不参与的时候，郭士立在许多事件中都是实际的谈判者。在战争期间，他担任被占领城市的民政官员、领队、船只航海消息的提供人、情报官员等。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的主要新闻发布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中国形象了解的问题上，郭士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郭士立拥有许多材料，关于中国地理学、气候、历史、政府、经济、宗教及习俗的，但这些情况却与那些带有偏见的比较、依赖于不正确实例的概括、从不正当渠道来的主题等相混杂。……它们反映了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对中国那些不现实的要求以及英国人陷入军事冲突时所具有的错觉。……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广州的贸易系统处在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下。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有广州迅速扩大的鸦片走私、中国白银外流，鸦片武装走私船在中国沿海规律地扩展，直到上海。而且除鸦片外，大量商品都绕过了海关税收人员。

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低级商务员负责人胡夏米统领了一次航海，探寻在广州以外做生意的可能性，郭士立在此次航行中充当译员。在北行至山东和朝鲜之后，阿美士德勋爵号船带着大部未卖掉的商品返航，业已卖掉的一些也折了本。公司的高级商务负责人和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会对于冒险的热情有所减弱，这部分是因为代价昂贵的尝试对于新市场的开辟毫无作用，但主要的还是害怕茶叶贸易会被郭士立和胡夏米强行入港的“粗鲁政策”以及他们各种不合法的行动，诡计所危害。

但这次航行对鸦片战争并非没有意义。详细的航海记录保持下来，郭士立能够利用他的关系人秘密得到一幅航海图或有关福

和顽固。

(第 22 - 35 页)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马士著

6、马戛尔尼向清廷提出的六条要求

马戛尔尼拟按照英国国务大臣的训令和东印度公司的意见，向清廷提出以下六条要求：一、增开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二、英国在北京设立货站，买卖货物；三、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拨给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四、将广州附近一处地方拨给英国；五、英船在澳门、广州之间运载货物免纳过境税；六、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则纳税，不另纳税。

(卷 2 第 225 页)

英国外交部档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原件缩微胶卷

7、英国财政部巴林 (Baring) 转交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 理事会上首相墨尔本备忘录。(1835 年 7 月 17 日)

根据中国政府规定的制度，不列颠商人的货物要放在行商手里出售，而货主对于行商卖货得到的款项又没有控制，对于他们的交易，也没有任何监督……这样，英国人的财产就有被行商用来偿还对清政府欠债的危险，众所周知，多数行商都处于破产状态之中。只要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定的状态，要想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大国进行贸易，一定要受严重的危害。对我们这样的以商业为利益的国家来看，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损害这种目标的障碍。

(F. O. 17/12)